



热烈庆祝 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隆重召开  
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把握新方位 践行新使命  
勇立潮头敢为先

— 浙江图书馆 —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

## 目 录

一、探索新模式，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4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背景的审视.....	4
（二）优化治理决策机制理论与实践的考量.....	9
（三）执政党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适应性变革.....	17
（四）融合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参与和回应.....	23
二、立足新方位，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29
（一）“新方位” 民族复兴的新航标.....	30
（二）把握“新方位” 逻辑下新理念.....	35
（三）寻找“新方位” 逻辑下新坐标.....	44
（四）浙江历史“新方位” 的新实践.....	50
三、明确新担当，谋求文化建设新发展.....	58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	59
（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1
（三）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74
（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世界影响力.....	79

## 免责声明:

浙江“两会”专题信息产品由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各成员单位联合编辑。信息内容采自公开的报纸、图书、期刊、数据库资源以及各大主流网站,每份专题我们都准确标明来源和出处,摘选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单位负责。

本期专题由浙江图书馆编辑,如您需要更为详细的内容及跟踪报道,请与该馆联络。

## 一、探索新模式，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9 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背景的审视

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研究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问题，进一步来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既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就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言，一方面，从国际来看，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复杂化、民主化、信息化等新的社会变化及问题，也出现主权国家政府机构臃肿、回应性差、效率低下等治理失效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产生了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进一步来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从内部来看，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四个范畴性概念的有机组合；从外部来看，是与国家统治能力、国家管理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与公共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相近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审视进一步来讲，而言，以多样化和动态化为主要特点社会复杂性席卷全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化、多层次化和多维度化的有机合作来应对时代的多样化，也要以多元主体的主动化、灵活化和开放化的有机合作来应对时代的动态化。就当今时代的民主化而言，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的今天，人们的自我意识、理性能力和科学技术都跃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民主要求也随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也形成了当今社会人们普遍意义上的参与治理的要求。就当

今时代的信息化而言，随着人们的信息意识进一步提升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电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产生和广泛运用，“信息生存”已经成为了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人们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几乎重新构建了一个“信息世界”或者说“信息社会”，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越来越强、方式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深。

就世界的现在于世界的过去来说，世界的复杂性是在不断的展开的过程中，当然这种展开既有世界自身演化发展的原因，也有人类认知欲望越来越强和认知能力越来越高的原因。

面对这种复杂性，人类只有两种态度：一是消极地面对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否认这种复杂性的存在，或者不愿意探究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及形态，或者即使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却有意的忽视，或者即使知道这种复杂性与自身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却持默然、超然或任其自然的态度；二是积极地面对这种复杂性，当人们认识到有效地面对复杂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时，人们开始探究如何有效应对这种复杂性，于是，人们发现建构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于是人类总是处在对社会复杂性认识不断加深丰富与不断构建应对复杂性的措施当中。

埃里克詹奇说“宇宙的演化是分化的秩序或复杂性的展开史。”人类社会作为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必然也遵循这一规律，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具体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其需要面对的复杂性问题，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后一个阶段总比前一个阶段需要面临的复杂性问题更多，或者说问题更为复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相比之下，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呈现出来复杂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多样化和动态化。当今时代的多样化和动态化主要是因为当今时代打破了禁锢的需求，打破了禁锢的价值，打破了禁锢的资源，打破了禁锢的方式，打破了禁锢的地域。人们在需求安全、温饱、尊严、社会地位的基础上，更加需求

的是自我的满足和实现。人们通过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的观念证明着自己一切价值追求的合法性，并抗拒任何其他价值观的干涉。每一个人都因为理性的增加和技术的运用变得更加容易获取他者的资源，资源的流动变得更加的多向度和更加的频繁。此同时，社会资源的组合结构越来越多样多态、组合路径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多态、组合程度越来越紧密深入等，这些导致了社会形式的越来越复杂。深度全球化的社会，意味着原来十分有效的管控措施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已经风光不再，而且能够产生效用的范围和可能性越来越小。

这样理解，以多样化和动态化为主要特点复杂性席卷全球的当今时代，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随之现代化，任何固守传统的所谓“经验”和“规律”都变得不再可行。我们的行动不可再是单一的、孤立的、某个区域性的行为，我们必须增强整体思维、联合行动、整体行动的能力。

就“民主”这个词而言，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只是后一个历史阶段比前一个历史阶段“民主”程度更高。

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的今天，人们的自我意识、理性能力和科学技术都跃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因此，人们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也随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从个体的成长来讲，一方面，人们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对外在他者认知和独立改造的能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生活在后工业社会当中的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要求越来越高，正是因为每个人认知和改造他者的机会和能力增强，跨越了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能力鸿沟式的差距，因此每一个人都要求在社会上有自己声音和参与管理的权力。与此同时，由于每一个人理性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者对自己必然或可能存在的压迫，于是他们越来越不相信他者会真诚地和完全地保障与满足自身利益，进而人们开始“反求诸己”，越来越相信自己才能真正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和真正发展自己。

此时，人们认为一切利益的获取和保障从根本上是来自于自身的力量，也就是说自身的力量决定了他的社会权力和地位的分配，这种力量已经越来越不是原初的身体力气，而是人们的理性能力，即通过理性认知、获取和运用一切规律和知识。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规律和知

识的巨大力量，认定只要自己有理性能力和合理运用自身理性能力就可以掌握这种力量，而不是通过外在他者的授予才可以获得。于是，出现了的权力的四重转换，一是从权力的争取转换为了力量的获取，二是从外在身体力量的重视转换为了内在理性力量的重视，三是从对外在他者授予权力的期待转换为了通过自身获取权力的努力，四是从自身向外投射而产生的对他者的防范和不信任转换为了对自身内在挖掘而产生的自我信任和对自身理性充满信心。导致这四重转换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理性的自证，具体来说是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实现理性自证的循环：第一步，由于社会生产和价值观念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人自身的价值，也就是更为深度地认为人的需求就是一切价值的宗旨，人的理性是实现一切价值的根本力量，于是，人们将人类的价值和理性作为了最高价值假设；第二步，正是人们将人的需求确立为最高和最终标准价值，于是消解了其他一切非人的价值观念的压迫，与此同时，人们又将人的理性力量作为实现人需求的根本途径，于是消解了一切非理性的力量、工具和途径的依赖和压迫，于是，人们感到空前的解放、自由、自信、快乐和效用。第三步，为了保障人的这种解放、自由、自信、快乐和效用，也为了证明人类需求价值的合理性与人类理性的有效性，人们就竭尽全力的去开发和运用人的理性能力，这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生活条件的巨大发展与改变，也更好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于是实现理性力量的自证循环。

正是后工业社会时代的这种民主化要求，期待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一种与传统民主不同的民主，要求公民自主承担起治理责任、公民间的沟通和协商、公民间建立起有机合作网络。这里，公民自主承担起治理责任，是要将自己从他治之中解放出，而自己从他治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自我责任和自我担当。公民间的沟通和协商，是人们通过相互的沟通和协商发自内心的自愿服从和执行，其本质是一种自我的服从、实现和统一性。公民间建立起有机合作网络，意味着合作不是简单的分工导致的外在化的合作，而是基于共同体观念的内在有机合作，这种有机合作是自愿、自主、多样和向善的。

虽然，人类每一个时代都是生活在信息当中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不断的获取和运用信息，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类历史的后一个

发展阶段比前一个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信息、更多的享有信息，信息对人类的改变也越大。

今天，随着人们信息意识进一步提升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继“物质生存”之后，“信息生存”已经成为了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人们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几乎重新构建了一个“信息世界”或者说“信息社会”。当这种“信息社会”的出现后，必然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顺应信息内在规律和形式以及它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治理能力也提出了多元参与和有机网络合作的要求。

分析信息社会要求的多元参与治理。当代信息技术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公民社会崛起的基础，当代信息技术的便捷性和容易性使得每一个主体都可以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和低成本，彻底摧毁了传统统治阶级或资本集团对信息的垄断，每一个主体都能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要求和意见，人们通过信息技术越来越容易找到持相似意见者，人们也更容易通过彼此自由的沟通和协商建立起紧密的团体和组织，于是基于意见表达和权利要求的公民和公民组织越拉越多。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自由表达的欲望和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被长期的压制与压抑，于是，出现了当代社会公民和公民组织要求参与国家管理的强大热情和强大力量，传统政府也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唯我独大”，因为，一方面如果不接受公民和公民组织的意见与要求，那么，很可能出现任何政府行为都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任何政府行为都很难取得预期的实效；另一方面如果不邀请或者让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国家管理，那么，很可能出现国家治理智慧的短缺从而导致治理的失败。进一步来讲，政府“退居一隅”是其继续存在的唯一选择，因为政府的能力已经无法独自承载社会的希望与寄托，也担当不起国家管理失效的巨大风险和责任。于是，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就成为了必然，成为了任何国家成员都无法拒绝的“权利”和“责任”。的确，在信息时代，在社会民主化、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以及媒体作用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和作用下，传统的组织管理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结构逐渐向网络型的分权式管理结构演变，普通大众将在和自己有关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

管理中的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开始向参与式民主或直接民主演变；这一切，也为人们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社会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知识的产生、流动、交融和创新，这就很大程度上地提高了人们获取知识和理解知识的能力，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更加便捷和自主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权利、思想和观念等。而且互联网的弥散性、自由性、全球性、流变性等，对传统的基于地域和科层的管理方式提出巨大挑战，国家治理必须实行更加扁平化的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方式。

分析信息社会要求的有机网络合作。一方面信息社会将世界联成了一张平面网。通常，当代信息社会很大意义上是指当代的互联网社会，正是因为互联网，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这样一个“平面式”的网络连接起来，主体与主体之间实现了“点对点”、“点对多”、“多对点”等多形式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信息社会使得主体间必须相互依赖也可以相互依赖。当今社会问题的问题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简单问题”或者“个体问题”，而往往是“巨大复杂的问题和与每一个人相关联的问题”，因此，没有哪一个公民或者组织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公民或组织有责任单独承担所有问题，也没有哪一个公民和组织有权利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来处理所有的问题。因此，这就要求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多元主体通过交换资源、共享资源、互动商谈和协商共识，从而采取共识性的集体行动。罗茨就认为，当代社会问题必然要求进行有机合作的网络化治理，其本质是更为自由的资源交换和联结，在信息社会当中各类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中各部门基于权威、资金、正当性、信息、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相互依赖，结合成一种联盟或利益共同体，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过程是一种资源交换的过程，如同交易博弈。因此，在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中，国家治理能力必然要多元主体具备积极参与的能力和有机网络化合作的能力。

## （二）优化治理决策机制理论与实践的考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历史新起点上，如何治好国、发展经济、

保障民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深入理解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事实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治理，它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动态系统”，在多元、持续、互助的框架下动员分散的治理资源走向合理的整合，以达到解决各种庞杂、专业问题的有效性。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把“本质上是参与”、“方向上达成共识”、“具有公信力”、“透明”、“积极回应”、“有效用和效率”、“公平和包容”、“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我们本着实现人民利益增值效应最大化的目标理解，现代国家治理具体涉及到“合作与参与”、“透明与公信”、“责任与理性”、“协商与共识”、“法治与廉政”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合作与参与的原则”。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在广泛的参与过程中，不仅能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也能够促进治理能力的提高。“广泛参与和民主的过程原则”不仅强调国家治理方式上的民主性，更强调“分享式参与的治理”所展现出的“强势民主”意蕴，强调其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积极方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广泛参与和民主的过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成员在广泛参与过程中能够提升治理能力、培养公民美德和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认知判断，另一方面只有在普遍而广泛的参与中，才有可能实践现代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平等、责任、互惠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广泛的参与和民主的治理过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第二，“透明与公信的原则”。所谓透明原则，指的是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以及为社会成员有效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透明原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一方面，社会成员只有在充分了解与公共事务治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这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协调合作的前提；另一方面，政府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信息，以使社会

成员能够有效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信息公开透明程度越高，国家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就越高。所谓公信原则，指的是治理主体依赖于彼此间对规范行为的认可而赋予的信赖、信任，由此而生成一个治理秩序。“公信原则”贯穿于治理主体间在治理活动的互动过程之中，它体现出的是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和信誉度，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绩效水平。

第三，“责任与理性的原则”。责任是国家治理秩序生成的重要基础，它一方面强调了治理主体间的互动要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责任，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增值最大化；另一方面强调了在治理过程中，每个治理主体都要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样在与其他治理主体互动过程中，既有责任提供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治理过程中的其他参与治理的主体，也有责任对其他治理主体的观点主张给予平等的重视，并做出有效回应。理性原则主要是指，在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要更多地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审慎决定，而不是基于私人性的考虑讨教还价，公共理性是引导着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达成共识的关键条件。换言之，公共理性使治理主体能够基于相互理解和妥协实现“共识性治理”。

第四，“协商与共识的原则”。“协商原则”指的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治理主体通过理性交流、沟通对话，来协调彼此立场，转换观点偏好，“对公共领域发生的冲突与争议议题，做一个持续且不断的理性对话与商议”，从而“带动公共治理秩序的顺畅运作，减少治理失灵现象的发生”。治理过程中的协商对话，是生成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这种对合法性的构建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治理的过程及其结果源自于治理主体的自愿性，另一方面治理过程及其结果是建立在治理主体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共识原则”就是要在治理主体在对话交流过程中，能够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从而形成一致的意见。质言之，“协商过程是表达偏好同时也是转换偏好的过程”，共识即是协商在治理过程中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五，“法治与廉政的原则”。“良法善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法治原则为国家治理注入了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基本价值，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

机制”。法治原则的主题体现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约束规范政府行为两个方面，其核心诉求是将公共权力的运行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轨道上，防止权力的异化、腐化。廉政原则强调的是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开放透明的方式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管理国家资源和公共事务，“清廉施政”、“公正廉明”是廉政原则的基本要求，相反，“渎职腐败”、“权力寻租”则是“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一个有效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政府的清廉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能力。

基于现代国家治理原则，治理决策机制的优化目标可以从“民主”、“科学”、“法治”三个维度上去审视，其中“民主”和“法治”是价值性目标维度，“科学”是工具性目标维度。

具体而言，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变革，是指“将民主机制引入决策过程中，使决策方案经过充分的协商、论证后，再由决策机构集体审议做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在决策目标和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在决策目标的选定上要注重对各方面利益需求的综合协调，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要求，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决策过程中要注重协商在利益聚合中的作用，使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得到均衡表达，决策前要充分听取意见，决策中要充分讨论协商、发挥集体智慧，最终的决策也要通过集体审议、集体表决做出。需要说明的是，在决策过程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决策机制民主化的内在要求。

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变革，是指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在充分调研、充分论证之后进行决策的制度安排。科学的决策思维方式就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主观、随意、盲目的决策；科学的决策技术手段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决策问题进行精准分析，提高决策的准确性；科学的决策程序就是要重视决策咨询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完善决策论证制度和决策调研制度。

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变革，是指“将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和决策内容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严格依照法律进行决策”的制度安排。就其本质而言，决策机制法治化，就是要把法治的理念贯穿于决策过程的

始终，既要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约束决策主体和决策参与者的行为，又要将决策权力的运行纳入到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有效监督决策权的运行。

从决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在机制优化中要注重健全决策监督制度，加强决策问责与纠错的机制建设，营造“阳光决策”的过程，要围绕“抓全面”、“抓重点”、“抓互动”、“抓监督”四个方面搭建起国家治理决策机制优化的实践框架。

这里，“抓全面”，即将公开透明覆盖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全部过程中，以此提升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的广度。决策前要及时向公众公布决策议题、决策信息，使公民能够全面了解决策问题，同时决策者要通过摸底调研梳理民众对政策问题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公布决策内容和决策参与的方式，决策中要完善会议管理机制，提高会议质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使更多的民众参与会议讨论，更直接的表达意见看法，更有效的进行协商沟通，决策后要及时对决策结果进行公开，通过“开放式反馈机制”回复公众提出的意见。

这里，“抓重点”，即以“互动参与”为导向推动信息公开，以此提升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的深度。要注重决策信息公开、党务、政务公开的及时有效性，决策信息公开和党务、政务公开绝不是对执政党决策结果的一种通报或告知，相反应该是决策过程透明在党执政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因此要以“互动参与”为规范要求深化决策信息公开和党务、政务公开的新形式，从而使公众在政策制定前和制定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参政议政，推动执政党的“阳光决策”。

这里，“抓互动”，即通过加强决策主体和决策参与主体之间有机互动的制度性平台来提升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的热度。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要求下，“群众路线”的治理意涵体现为通过对话协商，在党和群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互动关系。基于此，一方面要注重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性、程序性和支持性制度体系，搭建公众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和载体，保障和落实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从而改善公众参与决策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对决策相关知识的宣传和决策信息的公开，通过鼓励倡导，提高公众参与决策的自觉意识，激发公众参与决策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而改善公众

参与决策的主观条件。

这里，“抓监督”，即要使决策者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开展决策活动，并有效监控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实现决策者决策行为的负责可控，以此提升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的力度。基于“决策行为的负责可控”的规范性要求，要注重通过法律规范明确决策程序，以法规的形式对决策活动的环节和步骤进行规定，以决策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减少决策行为的随意性；要注重建立决策方案前置审查制度，对决策方案进行强制性咨询和审查；要注重完善决策评价和问责制度。此外，还应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或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决策信息公开、党务和政务公开、决策的内容和参与形式、决策的流程以及决策后回应反馈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实施严厉问责。

当我们以实践“阳光决策”的作为现实参照分析，在结构维度上，主要是以实践性、契合性、包容性为基本取向更新决策理念；以科学配置、明确边界、规范程序为内容优化权力运行；以均衡表达、理性协商、有效协调为目标健全沟通机制；以“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参与”为发展方向改进信息系统；以开放咨询、系统整合、客观公正为原则完善咨询系统；基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的双向维度强化监督机制。

更新决策理念：以实践性、契合性、包容性为基本取向。具体来说，增强决策理念的“实践性”就是要客观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此基础上阐明决策活动所要追求的目标并指明的行动方向。增强决策理念的“契合性”就是要在市场化启动的利益结构分化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转换决策理念的话语符号、义理结构，使之能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态建立起逻辑关联。增强决策理念的“包容性”就是能够将不同价值理念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有机整合起来，提高决策理念话语基础的广泛性。

优化权力运行：以科学配置、明确边界、程序规范为内容。具体来说，决策权力的运作必须纳入到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性要求内，即决策权力运行要“公开”、“透明”、“开放”。就科学配置决策权而言，从内部看，是要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通过合理分权实现权力运行，从外部看，就是要向社会授权，让社会成员能够自主

的表达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并能够得到积极反馈。就明确决策权力行使边界而言，指决策权力行使范围和行使边界要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完备的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全面梳理决策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编制决策权力信息表和决策权力运行流程图，使各决策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和界限内行使权力，抑制决策过程中出现滥用权力的问题，纠正决策权力运行可能出现的偏差。就规范决策权力运行程序而言。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决策权力运行程序公开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实现决策权力的规范性运作，减少渎职行为，避免权力运行的主观随意性，防止权力配置与运行的无边界、无秩序。

**健全沟通机制：**以均衡表达、理性协商、有效协调为目标。具体来说，以均衡表达、理性协商、有效协调为目标健全完善决策沟通机制，一是要借助“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等手段，为搭建群众“常态化”“低成本”的意见表达平台，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得到“充分”、“真实”、“均衡”的表达。二是要通过完善决策听证制度，来加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协商沟通，要通过加强“协商点”建设，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各方面意见诉求的得到有效协调，同时，还要在听证结论和决策结果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

**改进信息系统：**以“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参与”为发展方向。具体来说，第一，要促进信息公开透明，从制度化建设的维度，明确保密信息的级别和类型，从而使得信息公开有据可循，减少有些政府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信息安全为由阻挠信息公开、进行信息封锁的不良倾向。第二，要大力推进电子技术平台建设，优化公共政策信息系统的功能。要利用电子技术平台，拓宽决策的信息收集系统获取相关决策信息的渠道；要利用电子技术平台，促进决策信息的及时有效传播是公民有机会深度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实现电子参与和电子民主；要利用电子技术平台在政治家、高级公务员、智库和普通民众之间共享决策信息，提供决策建议和意见，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降低决策盲目性和失误。第三，要加快构建决策信息共享机制，获得更加全面的决策信息。要努力打破体制上的“条条块块”的限制，促进决策信息在不同层级不同决策部门之间的通畅；努力减少决策信息的因部门利益而遭到分割，打破信息壁垒；充分发展电子技术，拓展网络

的覆盖，疏通信息的反馈渠道，推进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参与。

**完善咨询系统：**以开放咨询、系统整合、客观公正为原则。具体来说，首先，新型智库的建设应当更加坚持开放咨询。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可以建立多领域、多类型、多元化的智库，然后以随机的方式在智库中抽取专家，组成决策论证委员会对决策议题进行独立调查论证，另一方面还应引入第三方政策评估论证机构。其次，新型智库的建设应当坚持系统整合原则。一方面，要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应当加大对民间决策咨询机构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力度，对从事非营利性决策咨询业务的民间咨询机构给予税收上的减免和精神上的倡导，扶持其发展，利用竞争择优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准市场化运作。使把官方、准官方、官非结合、非官方等各层面组织在同等情况下竞争发展。在另一方面，要加强机制创新，使各类智库进行有机高效整合，形成分工鲜明、合作互补的组织架构体系，注意区别全局性、专业性和体系内决策咨询研究活动，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工合作体系。第三，智库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应当保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始终坚持智库建设的正确方向，深刻把握特点规律，将智库系统打造为独立研究的多元组织体系，确保其研究活动不受行政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影响，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准确。

**强化监督机制：**基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的双向维度。具体来说，从决策权运行过程的控制角度，强化决策监督制约主要是要防范利益集团对于执政党决策过程的干扰，运用制度性手段防止对于公共决策的议程的干扰；要建立政策方案的意见整合机制，即在决策过程中将公共利益的整合建立在多元主体的协商沟通和综合协调的基础上，防范政策方案被单一的意见所主导；要在决策中建立决策规则体系，防范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侵蚀，加强约束，防止寻租现象发生。从决策结果的维度来看，强化决策监督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决策监督问责时严格明确决策责任划分。要明确集体领导下个人的职责，确立问责的基本原则，通过科学合理的决策评价标准划定问责的范围和界限。二是建立决策跟踪评估及反馈机制。注重通过抽样调查、民意测验等多样化的方式手段进行决策的跟踪评估及反馈，从全面性的角度构建完善的决策跟踪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

### （三）执政党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适应性变革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自诞生以来不断根据客观环境与任务目标的变化，进行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方面的探索与适应性变革，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反复试错中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在逐步推进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加强适应性变革，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党的领导与执政的新要求。

从政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它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领导和执政的关系。由于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双重身份”以及党与国家之间的“双重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与国家关系领域的适应性变革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主导性推动作用。

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是政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的关系更是如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在政党与国家关系领域的适应性变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从国家构建的角度看，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法治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变革的关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在规范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领导人民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和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在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国内利

益多元化和矛盾多样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中国的事情主要依靠党的领导和推动，而党的政策和决议能否落到实处主要取决于党员干部的效率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需要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提高效能。概言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党的领导和推动，要求党员干部高效有为，要求领导干部廉政为民，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做出适应性变革，积极加强党的自身管理与建设，卓有成效地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

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管理与治理，任务十分复杂而艰巨，从实践出发思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提出更高的新要求。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员干部树立踏实干事的态度。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性要求党员干部发扬奋发有为的精神。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艰巨性要求党员干部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

把握好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关系的特殊性，要着眼于党的领导身份与执政身份，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与各国家机关的关系，保障国家机构的自主性；协调好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机构的高效运转。

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本质由国家内在矛盾构成，公共权力的相对独立化使国家内在矛盾联系在一起并决定了国家自主性。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全体中国人民，国家自主性与西方国家有本质差别，但同样需要重视国家自主性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家自主性问题，合理定位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坚持依法领导国家和执掌政权。

合理定位政党与国家关系需要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党。毫无疑问，这里的政党指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国家。这里的国家指国家政权，具体指行使公共权力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机构。三是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政党与国家关系主要涉及

中国共产党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显然，合理定位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双重身份。

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拥有领导权，主要体现为制定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与把握道路方向，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和输送各级各类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人们的思想等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控国家政权，发挥国家机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目标。鉴于国家的自主性特征，国家机构更需要独立地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职能。首先，国家自主性要求党政职能分开。其次，国家自主性要求党政关系法治化。再次，国家自主性要求依法执政。

在中国，国家自主性更多地体现在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究其原因，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就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国家自主性严重不足。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先进性，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忽视国家自主性的“以党代政”执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变革，希望合理调整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基于治理国家现代化视角，中国共产党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的适应性变革应遵循这样几点基本原则：一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根本目标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从适应性变革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通过制度法律手段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真正实行依法领导。二要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执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权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目标是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适应性变革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从制度机制的角度完善政治的运行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好依法执政基本方法。三要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高效运转。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的直接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因此，既要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执政职能，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职能，这都需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实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在领导社会治理方面，不仅要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自身建设，密切党群关系，还要引领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更要改善领导社会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

这样理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方面，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在引导社会思潮时，需要根据社会思潮的价值取向判断它们距离核心价值观的远近。离核心价值观越远，表明这种社会思潮越需要特别注意，需要积极引导、批判或抵制。离核心价值观越近，表明这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越接近，需要大力支持。反过来说，支持与核心价值观相近的社会思潮，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核心价值体系，是引导多元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则；二要密切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党群关系，加强领导干部的自身素养并创新实践群众路线的机制。在复杂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干部的自身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改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另一方面要密切党群关系。领导干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主要体现在对每个公民的感情和态度并付出的行动上，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三要加强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的社会整合，既要转变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的思维方法、手段、转变和目标，又要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领导并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社会发展和管理，并不断深入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为了落实科学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社会建设和管理作为“五个统筹”，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十七大提出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十八大提出建立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部署怎样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系列重要会议和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与政党——社会关系的认识，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新的任务

目标，及时调整思路 and 措施，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适应性变革的最好注脚。今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好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治理的特点。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的主体通常是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二是社会治理方式多样性。社会管理一般采用行政规制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社会治理使用国家权威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三是社会治理客体的反应。社会管理的客体是被动接受政府的管理，而社会治理的客体主动与主体形成互动。第二，社会治理的模式。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治。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界限被打破。也就是说，治理者同时也是被治理者，被治理者是治理活动的经济参与者。二是共治，共同治理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治理机制的非对抗性和利益取向的可调和性。三是法治。法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性和重要性。第三，社会治理的路径。面对社会多元化特点，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一是改进治理理念。在价值层面要强调公平正义，在工作层面要注重以人为本，在实践层面要重视法律手段。二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教育、管理、服务和引导，给其更多活动空间和发展资源。三是提高社会自治能力。要提高基层社会自治能力，提高社会协同治理能为，改进社会治理工具手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和义务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党。面对“四个全面”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提高法治能力，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提高党组织依法办事的能力，必须着眼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能力：一是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三是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法治实践。提高党的依法领导能力：一是要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提高党在思想领导方面的法治能力；二是要遵照法治程序提高党在政治领导方面的法治能力；三是按照法治精神提高党在组织领导方面的

法治能力。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一是要提高党的法治公信能力；二是要提高党的依法规范权力的能力；三是要提高党的依法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与重要标志，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领域的最新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不仅需要依法依规处理好对内关系，更需要依法处理好治国理政中的对外关系。第一，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通过法治方式使个人、党派、社会和国家的事务界限清晰，以严格的法律规范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这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十五大到十八大，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不断深化，甚至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同时，党政落实和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并将这一治国方略结合到各项阶段性任务中。第二，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依法领导和领导方式法治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几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实施前提，即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二是实施基础，即完善法律法规；三是实施保障，即落实法治原则。面对这一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需要实现法治化，这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的制度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第三，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实现依法执政和执政方式法治化。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概念，是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必然选择。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但依法执政具有核心地位，它是科学执政和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和根本保证。党的执政方式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党执政方式法治化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 （四）融合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参与和回应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进一步扩宽，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参与方式也逐渐朝着个体化的方向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方式深刻改变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媒体一方面作为平台发布各种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摄取；另一方面通过接受报导、投稿、专栏、读者来信等方式为民众发声提供渠道，反馈民众的各种诉求。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人群中的个体更是日益成为信息的终端，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方式获取信息、发布信息。与之相呼应的，从上世纪末开始各级政府相继开通了官方网站，通过网站发布本部门的相关政务信息，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自由地获取想要的信息，并就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沟通政治意愿，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序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民主思想，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的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它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有序政治参与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我国，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有序政治参与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有序政治参与，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体现。人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立法，保障政治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第二，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以及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有序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我们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公民通过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反映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了解并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策。第三，有序政治参与是社

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性和秩序性，既可以缓解公民与国家的矛盾，又可以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有序政治参与可以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既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上通下达，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总之，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不仅可以推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还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当然，思考中国语境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必须突出执政党视野。突出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执政党视野，就是把问题纳入到党、国家、社会的大格局中，避免问题研究时“就政治参与论政治参与”。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解决好我们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党。我国语境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没有执政党的推动不会取得进步，没有执政党的引导很难走向规范。

第一，有序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具体来说，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而且意味着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最基本权利与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资格不受年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条件限制，享有政治权力。公民个体与职业政治家和国家公职人员不同，后者参与国家管理。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由公民自行决定放弃还是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

第二，有序政治参与首先强调秩序。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是比较充分的。但是由于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如果每个公民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及集体或者他人利益，就会导致政治运行混乱、利益表达无序，使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尊重他人权利也是公民确保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公民必须在进行各项政治参与活动时充分认同现有政治框架的权威性，既要争取自身权益，同时也要有宽容和妥协精神，有秩序的进行民主政治参与。

第三，有序政治参与必须理性参与。理性，是我国有序政治参与对公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行为要求。理性是指，公民在进行政治参

与时，做出的选择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受到外界一时的鼓噪和宣传所支配，而是出于清醒、自主的维护正当利益、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发展的理性考虑。它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公民政治参与时，既是实现权利的过程，也是履行责任的过程，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知识，进行独立自主的价值判断。二是必须能够在没有实现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公共决策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并给予支持。三是必须冷静对待，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一个经典命题。首先，这是一种政治理想的价值观取向。在新媒体尤其是网络通讯工具异常发达的今天，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直接民主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所以现代意义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正是通过扩大代议制之外的民主制度，让普通公民在正式的选举之外进行政治参与，以弥补代议制的原始缺陷。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还是一种具体的治国方式，在我国具有很现实的方法论意义。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则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途径。我们应该通过健全相关制度，让公民了解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并以听证、座谈等方式提出公民自己的意见建议，让国家的政策更好地体现公民的利益诉求，减少决策失误率，提高决策科学性；同时畅通公民监督渠道，以遏制腐败消极蔓延。的确，追求民主是人类的普遍理想，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个不断发展的历程。可喜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的角度来审视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的最终目标是能获得政府有关部门回应，如何有效回应信息技术进步和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政治参与影响，必须建构公众政治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

回到实践层面，置于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公共参与回应需要着眼于这样几点：首先，要增加政治信息透明度，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当前来看，信息公开对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影响比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的

影响更大，此外，从政策制定和实践的难易程度来看，信息公开水平提升也更为容易实现。

其次，要加大对已有政治参与途径相关信息的宣传程度。充分的信息公开，并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信息传递和新接纳。特别中国公众对政治信息接纳更多是处于被动接纳，因此，参与信息宣传和告知则构成提升中国政治参与水平的另一维度。比如目前中国广泛采用的网上信访和政府网上办公投诉，这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采用对解决传统信访纠纷带来一定益处，但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因为更多的上访民众并不熟悉这一政治参与路径信息。此外信息获取和使用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节，进而还能够促进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通过对有序政治参与引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再次，要客观认识新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既不能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刻意的夸大，也不能忽略其特定的影响。通过连接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对新媒体影响的评估，更为整体的把握和评估新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机制、和渠道，进而形成相应的国家治理对策。

还有，要注重中国互联网治理政策的差异性、连续性、连贯性和平衡性。碎片化的政策和临时更新的政策无法形成连续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不但会影响到政府决策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效能。差异化的国家治理回应不仅仅指的是针对地方政府差异，还指需要厘清互联网新媒体对社会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和参与行为影响的两个层面不同程度的差异。

总之，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渗透愈加深入，与此同时，政治自身改革和外部压力带来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等政治进步，不断吸纳当前所释放出的公众政治参与需求。嵌入国家治理框架中的政治参与回应模式，就确立地方政府回应的科学理念而言，一是要突出责任。创建责任型政府需要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内回应并满足社会大众的基本诉求，应承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理顺好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关系，接受内外监督来确保责任实现，因此，确立责任型政府理念的政府回应，需要政府进行快速回应，是对社会大众所做出的负责任的行为。二是要彰显责任意识。实际上，政府责任问题的前提是打破传统意义上权力惯性思维，做到责任行政，将注重以人为本作

为衡量责任政府价值标准，这一指导理念对政府官员来讲，需要政府官员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巩固这一执政理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责任意识，在遇到网络公众参与的公共事件时，才能突破原来权力思维惯性，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三是要公民的权利义务实现保障。社会大众的正常诉求应获得政府的正面的、积极的回应。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责任意识有密切关系，所以，责任型政府为全面提升回应效率，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回应机制，确保政府更好履职。只有坚持在责任政府框架下，才能对社会大众需求及时回应，确保提供的服务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

就加强政府回应的法制建设，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而言，首先，必须结合地方政府实际，做好回应机制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工作，根据相关程序、要求回应社会诉求，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使个人权力，不出现越权回应等不规范情况，并做好工作绩效的评估、监督工作。其次，地方政府在遇到公共性网络事件时，面对来自网络公众的质疑，需要充分尊重知情权，并创建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网络新闻发言人以及媒体，全面满足社会大众诉求，及时将信息发布给大众，这样政府不仅能掌握网络舆论的导向权，也能有效制止谣言传播，提升公信力。

就完善网络舆情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网络行政能力而言，一是掌握网络舆情相关信息，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网络事件信息系统，方便各级部门对信息开展系统性整合，这不仅能做到有效掌控事件的发展，也能确保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保持通畅，实现对网络舆情的信息共享。同时，也要全面做好网络信息的分析以及总结工作，建立专门的舆情提报机制，确保能做出及时预判。二是需要地方政府各部门实现通力协作，如果在网络上出现了舆情，需要通过各部门的互动合作，为快速回应打下基础，宣传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对事件相关信息的调研、处置等都需及时做出结论，科学应对网络舆情发展。三是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办公室。地方政府为建构相应的回应模式，需要结合实际，创建舆情办公室，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好网络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汇报以及回应等多个环节的工作，重点做好网络舆情回应，发布相关权威信息，引导网民实现正向参与。

就提高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明确公共政策输出渠道而言，

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借助网络以及其他媒体及时发布相关政策，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避免出现对政府的不信任事件，确保社会大众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其次，要明确公共政策输出渠道。当网络事件中的议题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后，就应将其纳入到政策议程进行设定，同时做好公共政策输出工作。

的确，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信息技术的改变，还是政治机会结构性的变革，带来共同的效应即政治参与的兴起，对于中国尤为如此。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政治参与的扩大有效嵌入国家治理框架之中，将其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之中值得深思。今天，实现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要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和听证制度等现有体制机制的发展、完善、细化和可操作，更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公民借助互联网表达政治态度、主张利益诉求的现状，以及为非政府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一个法治健全、运行规范和谐有序、充分表达意愿和诉求的渠道和途径，通过互联网渠道和民间组织途径、疏通和引导公民有序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而不至于在现有选举等机制下个人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充分表达和有效回应后，利用互联网进行非理性宣泄，甚至以讹传讹；避免当前因法制不完善而疏于监管的那些“民间组织”有机可乘，做出一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和规范。有损国家和社会安定的行为。这样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得到有效表达和回应，在其他非体制渠道也能得到有序、依法合理、充分表达和回应。

本栏目参考文献：

- 1、钟林.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6, 01: 77-84.
- 2、吴桂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论[J].中州学刊, 2016, 04: 1-6.
- 3、姜淑兰, 张丽红.怎样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 05: 89-93.
- 4、欧阳康, 石德华, 钟林.社会公正的复杂性与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特殊性——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路径[J].哲学研究, 2016, 08: 97-104+129.

- 5、景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伦理内涵[J].领导之友, 2016, 05: 5-8.
- 6、闫辰,王海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 一个文献述评[J].社科纵横, 2014, 06: 70-74.
- 7、闫辰,颜德如.论执政党意识形态适应性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 2014, 06: 5-12.
- 8、闫辰.有效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政治整合机制创新[J].法制与社会, 2011, 05: 194-195.
- 9、闫辰.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D].吉林大学, 2015.
- 10、张健, 闫辰.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推动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变革[J].理论观察, 2014, 08: 38-39.
- 11、吕虹.论全面从严治党的继承性与创新性[J].理论学刊, 2015, 07: 24-31.
- 12、吕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变革[D].山东大学, 2015.
- 13、刘鹏.执政党视野下的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 2013.
- 14、臧雷振.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D].北京大学, 2014.
- 15、欧阳李立.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模式构建[J].人民论坛, 2016, 11: 43-45.
- 16、马辉, 马红武.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创新[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16, 04: 84-88.

## 二、立足新方位,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 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新常态做出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 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

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 （一）“新方位” 民族复兴的新航标

### 1、认识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连续召开 4 年。梳理每年会议精神可以发现，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定力与坚守，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与突破。4 年多来，“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指引着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向世界勾勒出一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画卷。

“政贵有恒，事在人为。” 4 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始终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本月 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将这一总基调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我们党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高度。稳中求进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稳”是基础，“进”是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稳”才能更科学地推动“进”、更持久地向前“进”，而没有“稳”的“进”只是空中楼阁；“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而没有“进”的“稳”就相当于原地踏步。牢牢坚持稳中求进，方能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方位，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处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最大特征就是新常态。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 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新常态的表象特征、内涵特征，并提出了因应变化的经济政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由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我们准确认识中国经济新方位的大前提。

处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必须更新。理念是行动先导，指挥着脚往哪儿迈、劲往哪儿使。新常态下，环境变了，条件变了，亟须通过创新发展解决动力问题，通过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问题，通过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通过开放发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通过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标定了中国经济新方位的前行航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处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5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新方位上的新的重大实践。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中国经济新方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关键节点。越是情况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团结一心、苦干实干。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识新常态，明确新理念，投身新实践，以扎实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方位上实现新发展。

## 2、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境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17 年经济工作。变中求新、新中求进、

进中突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崭新的位置上，中国经济新方位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境界。

这个新境界是创新发展的新境界。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汗水，是资源，今天中国经济已经站在崭新的方位上，必须依靠创新，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境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起雨涌。“互联网+”这个风口上，新经济类型喷薄而出。

这个新境界是协调发展的新境界。在昨天的经济发展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一个行业突然崛起，让人惊叹，成为传奇。但是，随着新常态的逐渐形成，这种突然崛起的现象会逐渐消失，一个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时代必然到来。在经济新方位上，协调经济必然神采奕奕，精彩纷呈。

这个新境界是绿色发展的新境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绿色经济正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绿色经济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绿色经济更健康，更阳光。站在经济新方位上，绿色经济前途光明，精彩纷呈。

这个新境界是开放发展的新境界。改革开放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法宝之一，今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开放经济必然更上层楼，我们不但打开大门，让外边进来，我们还要迈开步伐，走出去。中国经济新方位。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经济新方向。

这个新境界是共享发展的新境界。共享理念从小企业到大企业，从中国经济到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新方位，正悄然打造一个共享发展的新方向，在新方位上，共享经济必然逐渐成为造福中国，造福世界的崭新经济战略。

中国经济新方位，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境界，为世界经济发展将树立一个新的样板。

### 3、发现中国经济的新动能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新常态当有新认识。7.7%、7.7%、7.3%、6.9%、6.7%……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而来自一家财经媒体对权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对于今年三季度的中国经济，54%的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达到L型“竖杠”末端，38%认为已经进入“横杠”，只有8%认为尚未到达“竖杠”末端。从中不难看出，经历了奋力追赶、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凡事总有规律。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就拿速度变化来说，诚如人民日报刊文所分析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按照经济学原理，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因为，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

新理念标定新航向。基于此，早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就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强调，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回答了新常态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为经济新方位标定了前行航向，旨在为处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往细里说，创新发展，着眼解决的就是发展动力问题，避免动力衰退；协调发展，着眼解决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避免失衡失重；绿色发展着眼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避免环境透支；开放发展着眼解决的就是发展内外联动问题，避免画地为牢；共享发展着眼解决的就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避免社会动荡。

新方位展现新作为。“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2016年又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综观这一年，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引领中国经济拨开迷雾，实现缓中趋稳、稳中蓄进的发展态势，赢得“十三五”良好开局，也向世界传递出坚定的发展信心。据观察，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惠誉把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从9月预测的6.5%上调至6.7%，将对2017年预期从6.3%上调至6.4%。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下调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维持今年中国经济增速6.6%的预期不变。

良好开局昭示辉煌未来。踏着铿锵的脚步，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即将走进2017年。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可以想见，处在新方位的中国经济，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引领下，必定能够进入质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唯此，中国巨轮也必将劈波斩浪，成功驶向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彼岸。

#### 4、定位中国经济的新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盛大召开，来年国家经济发展走向定调在即，不仅全国上下格外关注，而且全国目光高度聚焦。在中央就大政方针做出决策部署的这一关键时刻，无论西方主流媒体给予一年来中国经济的积极评价，还是一些国际机构高管对中国经济转型成效的高度肯定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普遍看好，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实践，应对引领经济新常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可谓有目共睹，尤其是传递出确定中国经济新方位的鲜明

信号，更催人振奋、令人期待。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不振、徘徊不前，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而就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为经济复苏愁眉不展、无计可施、难有起色的关口，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仅沉着应对、能动而为、科学施策，连续多年来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出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突破性、创造性的新思路、新对策和新措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稳增长的预期目标，更起到了阻止全球经济继续下行的牵引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然而，曾几何时，极少数西方国家或对中国实践、中国努力、中国智慧等的认识不足，或出于其他诸多利益方面的自我考量，不仅无视中国稳中求进、稳中提质继续呈现出中高速增长良好态势的客观事实，无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策略撬动世界经济增长所做出的努力和显露出的积极效果，而且还出现了某些刻意唱衰中国经济的不和谐论调。中国经济迎战新常态呈现出的“L”型良好走势，就业、消费、民生等各个领域的良性运转状态，都用无可置疑的事实和数据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一个正在强势、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在做好自己的事、搞好自身发展的同时，一直致力于释放促进全球经济启稳增长的中国动力，G20杭州峰会、乌镇互联网大会以及其他重要国际议事场合，我们始终热心贡献“中国智慧”，毫无保留地提出“中国主张”，就构建优良世界经济秩序、谋求全球经济加快复兴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议 and 对策。新常态催生新理念，新理念导向新方位，新方位奠定新坐标，中国明确提出经济新方位的全新发展方略，同样不失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航标，不仅将指引中国经济世界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而且必然会引领全球经济驶向理想新境界。

## （二）把握“新方位”逻辑下新理念

### 1、新发展理念标注中国经济新方位

这是一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行进在新常态的快车道上，中国正在奔向一个关乎未来的重要节

点——此时，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差不多 4 年时间。

“2016”，这个数字既代表着“十三五”的崭新局面，也代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年迈入了决胜阶段。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点，如何以新姿态适应新常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康社会？如何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的“十三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十三五”开局之年即将过去，新一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能够看到，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翻开了以创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篇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拉开了以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序幕；

“绿色化”，指明了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新常态的新路径；

“一带一路、亚投行”，彰显了以开放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担当；

“精准扶贫”，践行了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思路。

在这样短时间内，中国为什么产生如此大的变化？下对“药方子”，拔掉“病根子”。

这句话体现了新时期中国要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对变革的迫切渴望。

回顾历史，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为了解决相对落后和贫穷的问题，我国开始实行赶超战略，集中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将积累社会物质财富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

这一时期的发展路径，为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换来了时间，也拓宽了空间，使我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日益突显。

当前，我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期，面临着结构转型时期的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发展理念必然也要发生新的变化。然而，新理念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站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方位基础上，针对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不断的“望、闻、问、切”，一步步艰难探索出来的。

中国发展的进程正是这样一个思路升级、理念更新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只有“对症下药”，不断创新，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才能实现更加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 展，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面对紧迫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如何应对？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出了“新发展理念”这一剂“救世良方”。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简单的5个词、10个字，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

坚持创新发展，着力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着力解决不平衡问题；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坚持开放发展，着力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坚持共享发展，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创新，为谁创新？协调，为谁协调？绿色，为谁与自然和谐相处？开放，为谁开放？共享，谁来共享？

一切为了人民。

这“新发展理念”，如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围绕“人民”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中，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有更多获得感，从而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普遍提高。

这“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彼此相互贯通、相互吸引、相互促进。五个理念缺一不可，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唯有协调发展、统一贯彻，出实招、破难题，才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剂世良方”。理顺了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指明了发展新方位，是迄今为止在党的报告中对“发展”内涵做出的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概括。

可以预见，有了这样的“新发展理念”，不仅会破解我国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方向，也会为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正由增量扩能向调整存量阶段全面调整，经济模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模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全面转型，经济动能正由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动能全面转变，经济方位也正由传统制造业主导的低端水平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的高端发展阶段全面过渡。可以说，经济的新结构、新模式、新动能、新方位等一系列新特征正在逐步孕育壮大，即将破茧而出，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崭新力量，引领中国稳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正是怀着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带着敏锐的判断眼光，中央提出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认识、适应、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国家战略重大创新举措。这一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顶层设计制定、具体方案出台，再到各地区各部门切实落实和推进，已经取

得了扎扎实实的初步成效。在去产能方面初战告捷，2016年4500万吨钢铁和2.5亿吨煤炭去产能任务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带动PPI由负转正；在去库存方面成效初显，截至今年8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已经连续6个月减少，房地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在去杠杆方面获得进展，2016年10月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取得成效，2016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同比下降0.13元，降成本总额预计全年高达1万亿元；在补短板方面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启动，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速，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国家战略高度层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中国指明了经济新结构的必然方向、经济新模式的突破路径、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经济新方位的必经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制定与出台，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推动改革所面临的复杂利益掣肘局面，项项瞄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也充分关注到中国当前阶段必须以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以全面促进实体经济部门国际竞争力提升为主导的关键发展任务。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后续中国普通员工工资的可持续增长、高人力资本就业岗位创造、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间阶层的持续扩大、内需驱动增长模式的强化，提供了以实体经济部门作为依托的坚实基础。

2017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制定”“落实”转向“攻坚”、迈向“深化”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纵深”和“深化”之期，要把握好改革强度和稳中求进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坚决打破各种地方利益藩篱，纠正某些地方政府的认识误区，积极处理和把握好推进五大任务、主动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适度扩大总需求、深化行政机制体制改革的关联互补作用，发挥这四者的有机结合作用，毫不动摇地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落实和积极推进，充分预防和化解各种地方性和全局性金融风险以及其他风险，要力争在

改革中控制风险、化解风险、消除风险，做到在经济发展的“稳”中来求“进”，在“进”中把握好“稳”的尺度和力度。

其次，在深化改革之期，要把握好关键领域突破和系统协同推进之间的有机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改革，核心是机制、体制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的推进要与相关领域的重点改革使命相结合。要在去产能工作中落实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任务，要在去库存工作中构建中国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机制，要在去杠杆工作中破除中国的金融风险 and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在降成本工作中要通过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着力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在补短板工作中纠正导致中国城乡之间、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机制体制因素，破除阻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体制障碍因素。

最后，在深化改革之期，要把握好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加快经济新动能培育之间的平衡关系。当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忽略了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对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信息化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业以及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对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支撑作用。制造业不仅是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的关键推动力量，更是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力量。因此，要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三者的包容性和兼容性，既要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现阶段中国多数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注意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推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发展变革。

### 3、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站在新方位上，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问题？将会延续什么样的走势？如何有效推进改革？

田是国内知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家获得者。他认为，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更好发挥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

“2016年中国经济有回稳态势，但我认为，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6.7%的增速还有较大落差，中国经济本可表现得更好。”

尽管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入下行通道，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在近些年差距过大，超过两个多百分点。能否减小这样的不正常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的成效。

如果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及政策应对恰当，则在“十三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左右，从而实际增长率可以有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速。相反，如果改革陷入停滞，则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的下滑。

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尤其发达经济体中以欧盟内部动荡和美国总统换届可能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当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还是许多部门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没有解决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大搞“空对空”和形式主义，各种新概念和文件层出不穷。

预期，2017年的增长目标数据会有所下调。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驱动转型滞后。具体体现为需求结构失衡，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失衡，内外需关系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质量不高，创新不足；市场结构失衡，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二是体制结构的失衡，发展逻辑错位，主要体现在“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大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地方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累积，造血机制不足；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

严重不作为的问题，及对“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多重原因造成的。

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治理逻辑失灵，也就是决议、决策和下面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力差距大的失衡。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真正遵循中央决议精神，特别是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方向改革。”

“靠政府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人为地层层分解任务式地去产能和去库存，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并且可能会出现激励扭曲，把一些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而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乃至僵尸企业却仍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扩大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并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策。”

“对于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创造一个合理的竞争性市场制度环境，要远比制定实施“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具体的产业政策来得更为重要。

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不是靠有为政府、靠国企，而是靠市场、靠民企。所谓创新，首先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赴后继地往里投。

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是最敢于冒风险的，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

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离有限政府的定位还很远，因而需要通过市场化制度改革取向来建立有限政府和现代市场制度，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解决中长期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长治久安。”

#### 4、筑梦中国经济新起点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经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系统阐述。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2016年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进军，打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战。前三季度经济增速6.7%，也足以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作用下，国民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顺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一年来，在“双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变革创新背景下，新的有效供给也正在带动新需求聚合新动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

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机者如神，难遇易失。”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扩大对外开放，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亚洲和世界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多福祉。

### （三）寻找“新方位”逻辑下新坐标

#### 1、“新方位”时空坐标和哲学思辨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里有句话：“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王夫之这里把“理”视为事物的固然，而“所以然”的新意在于，揭示“理”作为本然、规律、原因的特征，使其真正成为具有思想内涵或哲学意义的范畴。

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更是如此，它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昨天，《人民日报》发文首提“新方位”。文章开始的“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经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袁清认为，理解切中了“新方位”的“时空坐标”和“哲学思辨”。

“时空坐标”，文章中“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表述了中国经济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感。

“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节点”，诠释了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中，中国经济所处的战略空间。

“哲学思辨”，从文章中的“新常态，新变化”、“新常态，新坐标”、“新常态，新认识”、“新方位，新理念”，到最后的“新方位，新实践”，揭示了从确定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到正视过去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凸显风险，所着力的包括供给侧改革的全要素、源创新的驱动发展。

“新方位”提法，袁清认为，思考还有“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的哲学思考。“新常态”，是当下经济的特征，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而“新方位”，则是“坐而论道”后的“起而行之”。辨识洪流，扬起风帆，投身实践。在“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的中国经济航船上破浪前行。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曾经深刻指出，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袁清认为从“新常态”，到今天的“新方位”，可谓是中国实践的新经济学思想。

袁清认为，无论是所谓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还是人力资源优势，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一定是思想高度。

## 2、经济企稳助力站上新方位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1 月份最新经济数据中，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显示积极变化累积增多，结合海关总署等公布的数据，11 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强劲、超出预期，经济运行“三驾马车”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愈发明朗。综合各方信息判断，中国经济短期增长压力已经缓解，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已成为政策焦点。

生产、需求、预期等积极变化来之不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度遭遇“三期叠加”阵痛。为政者高瞻远瞩、谋定而后有力作为，使中国经济螺旋式上升到发展历程的新方位，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门槛上，可以眺望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孕育的新图景。

世界经济温和复苏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最新的高盛全球领先指标显示，2010 年 12 月以来的最强劲环比增长，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 PMI 均有所改善，区域贸易数据整体上行。美国道琼斯指数从 6000 点上升到近 20000 点、美联储第二次加息，表明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10 年周期已经度过危机、萧条，正从复苏爬行到繁荣的岸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2016 年的 3.1%，上升到 2017 年的 3.4%。

中国经济的巨轮航行在新的历史方位，远方壮丽的景象逐渐呈现清晰轮廓。但前程不会风平浪静，“依着自己的桨叶歇息”，搁浅甚至

沉沦的悲剧在世界历史上多次重演。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金融风险显现、部分地区困难较大等问题，都需要谨慎应对。其中，构筑“房地产长效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是着眼当下、惠及长远的政策选项。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拉动作用突出，但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部分热点城市房价飙升，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在稳增长压力减轻的情况下，如何平缓挤出泡沫，将考验政策的智慧和执行的艺术。以限购、限贷甚至限价为为主的楼市调控政策，只能针对楼市短期需求，可以暂时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今年“9·30”以来部分热点城市出台政策为市场“退烧”，从数据上看已经收到初步效果。但能否借助住房、土地、财税、金融以及不动产登记等政策性工具，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尤其是不动产登记、房产税等政策工具成色如何、能否落地，将为各方关注。

新方位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中国经济更深层问题，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期许。比如国企改革，如何从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入手，建立健全现代管理制度，提高效率和透明度，让庞大的国有资产及其红利能够更多惠及民生；比如政府机构及职能改革，如何在压缩“三公经费”、减少审批事项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简政放权，该管的管住、管好，该放的放开、放活；再比如以独立审判、公正执法为突破口，构建约束公权力、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制度保障，提振民营企业对未来的信心，遏制民间投资下滑势头，将直接关系到繁荣的根基是否稳固。

经济形势短期企稳，仿佛在严冬感受到春意，但改革果实的丰盈，取决于我们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劳作。

### 3、发展内外联动找准“一带一路”新方位

新常态下，中国亟须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需要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作为重要的践行主体，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可以在“一带一路”中找到自己的新方位，借助政策红利发展壮大，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民企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本

届“人民财经高峰论坛”以“中国经济新方位”为主题。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在致辞中开宗明义：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嬗变。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保障各项工作“不落空”、经济运行“稳得住”的关键。

“激发一带一路‘新活力’”是论坛圆桌对话主题之一。“即将告别2016年，要迎来新的2017年，在这个时候探讨新方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认为，中国经济新方位中，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或是今后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新坐标——而“一带一路”倡议既顺应了中国海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趋势，又呼应了全球对于高质量跨境投资、创造新型全球化的大诉求。

中国银行中小企业部总经理王健对推动国内中小企业“走出去”念兹在兹。“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融资也难。他们有技术、没市场，中国的中小企业是有市场、技术差。所以我们让二者优势互补，互联互通。”

在王健看来，国内中小企业的问题并不是给钱就能解决的。“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普遍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竞争力差，能耗高，污染也重。这种企业你即使给它贷款也没用，银行还会跟着一起倒。”王健坦言，“企业难，银行也难。出了问题，银行要追究责任。”

同时，王健强调，虽说中小企业相对有“风险”，但这个群体正发生新变。而如果银行不敢承担风险，那就失去了所有机会。“所以，最主要的是看银行能不能驾驭这个风险。这对银行来讲是考验。”他看好的做法是为国内外的中小企业“牵线搭桥”。“我们觉得银行在给贷款的同时，一定要帮助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帮着他们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王健介绍，中国银行自2013年开始，已做了近30场撮合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的服务交流会。交流现场配备一对一服务人员，随时提供对接金融服务与翻译。“欧美发达国家全做了。上至总统，下到企业，都非常欢迎。”王健说。

“企业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能否成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一带一路’建设考验我们

的效率、安全和精准投资。”早在年初，王文就曾围绕“一带一路”对企业建议：重拾冒险精神；吃透政策，融入到国家战略红利中去。

“华信集团走出去，面临三方面考验。”中国华信党委书记蒋春余说，一是政治方面，外国政府更替带来风险；二是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深耕能源与金融两大领域的华信集团要面临更复杂的博弈环境；三是意识形态、舆论方面的考验。“在‘走出去’的战略中，民营企业也是弱势群体。”蒋春余说。

据了解，华信集团凭借对政策的深刻理解，在对外合作中频频进取——收购捷克 J&T 银行 50% 股权，成为首家控股欧洲银行的中国民企。同时推动 J&T 银行作为捷克政府方代表与中国工商银行共同设立中国-中东欧投资基金，支持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协助中国企业对接“一带一路”投资。

由“倾销”问题引起的贸易摩擦，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之一。任职找钢网近一年的首席战略官、前央视主播郎永淳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钢材的需求量很大。对于既满足当地需求，又不受到反倾销制裁，找钢网的尝试初见成效。

“以前钢铁是通过中国的出口代理商，再到国外的进口代理商，最终进入到当地市场的，是以批发价，甚至远远低于当地零售价进入海外市场。所以他认为你是低价倾销。”郎永淳解释，找钢网则采用零售模式进行销售，“并且在当地设立公司，是当地雇员、当地零售的模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 4、校准我国经济的新方位

习总书记提出“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开始了一次系统性升级，形成了以创新为驱动，把改革作两翼的全新发展模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梳理过去，展望未来，为中国经济新方向校准方位。

首先，校准“新方位”要以认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基础。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如是说。总书记将认识“新常态”作为大逻辑的起点，实则强调了认识的基础性作用，换句话讲，假如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没有全方位的认知，或者认知出现偏差，其他政策上的实践将南辕北辙

甚至功亏一篑。过去，我们习惯国内生产总值呈递增态势，当经济数据下滑时，我们对此疑惑不解，究其原因，乃是源于对当下经济发展形势认知的偏差。中国历经 30 年的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客观规律决定，总量和基数变大后的中国再“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另外，多年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问题也在凸显，这个风险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化解。只有我们认清这个客观现实，面对经济迷局时才能表现出更多的从容和自信。从这个角度讲，“新常态”俨然成为一本行动指南，为我们找准经济“新方位”提供了科学解释。

第二，校准“新方位”要以坚持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为指导。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常态下，我们党为了使经济政策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操性，创造性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理念。其中，“创新、协调”是手段，“绿色、开放”是着力点，“全民共享”是根本目的。我们知道，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经济内生动力，就是要摒弃过去那种过分消耗资源、结构不合理的发展方式，通过“创新、协调”的具体思路，统筹解决经济、环境和全球治理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全民共享改革盛宴的最终目的。从这个层面讲，“新理念”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们要以“新理念”为精神导向，在校准“新方位”过程中，不断纠正自身问题。

第三，校准“新方位”要以开展经济发展的“新实践”为目的。实践是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新常态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研究，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伟大实践。其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长期来看，要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平衡供需关系，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寻求新动力，找准切入点，从供给端改革开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更具活力。因此，在瞄准经济“新方位”的具体实践中，要用“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等新型实践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

## （四）浙江历史“新方位”的新实践

### 1、坚决贯彻总基调 坚定打好组合拳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27 日举行。省委书记夏宝龙在会上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要求，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定不移持续深入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奋力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车俊就明年经济工作作具体部署。袁家军和其他省委常委出席。

夏宝龙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重大决策，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重大调整，经受了实践检验，完全符合实际，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是基石和起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阶段变化的客观性，采取新的发展战略，激发新的发展潜力，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要引领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是治本良方。我们一定要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浙江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根本点在于稳定大局、不断进取，是方法论。要有稳的定力，认清大势、顺势而为、从容不迫。要科学分析研判形势，透过数字看规律、透过现象看本质，瞻前顾后、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看协调性、看匹配度，坚定信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牢牢把握“三个重大”，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思路和办法，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蹄疾步稳、行稳致远，朝着我们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夏宝龙指出，2017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2017年也是我省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是干好“一三五”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最关键的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总书记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总体思路，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不走样，忠实执行不打折，狠抓落实不懈怠，全面贯穿到明年各项工作始终。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提出的总要求，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抓好工作，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推动城乡区域协同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夏宝龙指出，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是我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浙江工作一贯要求的实践成果，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经过几年探索，组合拳已深入人心，成效日益显现，经验十分宝贵。组合拳必须长期坚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善作善成。要全面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地打、持续深入地打、充满激情地打，突出打赢“拆治归”三场大仗，突出创新驱动发展，突出实体经济提升发展，突出“互联网+”“标准化+”，全力抓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全面破除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的民生之痛，倒逼生成淘汰落后、优化结构的动力之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奋力开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境界，努力把“浙江的今天”建设得更好，为“中国的明天”贡献更多的浙江实践、浙江素材和浙江经验。要坚持组合拳基本套路，纵深推进、坚决打赢“拆治归”三场大仗。要掌握组合拳核心要领，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加快生成。要强化组合拳基础支撑，用好“两只手”配优资源增强活力。要继续狠抓治水拆违倒逼转型，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转型，掀起抓重大项目抓招商引资高潮，抓实有效投资支撑转型，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发展实体经济推动转型。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农民增收门路，确

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加快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坚决打好打赢畜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努力走出一条畜牧业绿色发展新路子。

夏宝龙强调，全省上下要清醒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浙江对外开放所处的历史方位，锚定有利于更好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发展大局，锚定有利于更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前进方向，进一步拉高标杆，打造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样板。努力挺立在从全球经济治理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的潮头，在落实国家开放战略中作出“浙江贡献”。着力推进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中创造“浙江高度”。加快推进从出口主导向全面提升国际化水平转变，在巩固扩大 G20 杭州峰会效果中提升“浙江声誉”。不断推进从政策性优惠向体制性开放转变，在我国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中贡献“浙江智慧”。

夏宝龙强调，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各级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牢牢扛起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充分展现换届后新班子的新状态新作为，切实提高经济工作领导能力和水平，想干敢干勇往直前地干，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尽心尽力把明年经济工作做好，确保如期顺利交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好成绩单。

车俊对做好明年经济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坚定不移、持续深入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扩大有效投资切入，着力提高发展质量、供给质量，全面振兴实体经济，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要切实抓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工作。重点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结构性目标，优化投资结构。要加力打破、全面清除拖累浙江转型升级的坛坛罐罐，进一步加大治危拆违力度，加快消灭污泥浊水和淘汰落后产能，去除“两链”风险，抑制房地产泡沫；积极修复传统动能，聚焦 10 大传统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并力争先行取得突破，大力推进“四换三名”“互联网+”“机器人+”“标准化+”等举措，加快改造提升开发区、工业园区，积极推进农业绿化、农村美化、农民转化；

发展壮大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经济，积极发展八大万亿产业、都市经济、海洋经济和生态经济等；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深入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最多跑一次”倒逼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积极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扎实推进国家战略举措、县域改革试点等各项重大改革落地；切实改善民生，鼓励创业、扩大就业、促进增收，积极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深入开展平安浙江建设。要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桥头堡为目标追求，大规模引进外资大项目、好项目为重点任务，大力实施优进优出战略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我省新一轮对外开放。他还就抓好岁末年初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提出了要求。

## 2、历史新方位怎么找

面对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和自身“成长的烦恼”，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率先实现现代化，是浙江发展到今天的历史性考题。

近几年来，针对制约浙江发展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浙江打出了一套以治水为突破口，以“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四换三名”、“四边三化”、“一打三整治”、创新驱动、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七大万亿产业培育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坚持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要求推进转型升级，每一招每一拳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招。近年来，浙江经济的活力就在于，全省上下坚定不移地打好这套组合拳。站在浙江当前所处的历史新方位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创新招式招法，继续坚定不移地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拆治归”，三招核心拳打通转型脉络。当前的浙江经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供给结构新与旧、供给水平高与低相互胶着，要素配置扭曲……面对这样一种“拧巴”的发展状态，怎么打通经济转型升级的任督二脉？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是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最核心的招式。这三个核心招式，本质上是在浙江这一省域范围内，根据自身实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打出的“先手拳”。对症下药，意

在理顺浙江经济转型的脉络——“拆”和“治”通过空间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集中整治消化低端过剩产能，“浙商回归”则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引领中高端产业回归发展。

今年以来，我省结合“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 1011 家、整治提升“脏乱差”“低小散”企业（作坊）1.59 万家，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面淘汰“低小散”落后产能，一面扶持有创新活力的小微企业。全省各地各部门优化服务，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新动力。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浙江所有市县全部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新设小微企业 18.7 万家。

对江河之水制定标杆尺度，对违法建筑零容忍。所有产业和企业都必须遵循标准和规则，别无他选。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3.7%，降幅比上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38 个行业大类中有 24 个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通过“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我省浙商回归项目势头强劲，回归项目的质量也不断提升。据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前 10 个月浙商回归省外到位资金累计 3099.31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1.16%，同比增长 19.37%，已经超过去年省外到位资金的总量。

新常态下，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发展逻辑——“三改一拆”盘活了稀缺的土地资源，为新兴产业提供了空间；“五水共治”缓解了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倒逼“低小散”企业转型升级；“浙商回归”引领新兴产业回归，以新产业拉动潜在的新需求。

新动能，联动发展融合新旧产业。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

我省从 2013 年开始实施的“四换三名”，推进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是浙江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正为浙江实体经济注入升级新动力，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动能。

正泰电器实施了“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

化车间的研制与应用”项目，将生产效率提高 20% 以上、运营成本降低 20% 以上、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0% 以上、能源综合利用率提高 4% 以上、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0% 以上。

以智能化为突破，一种“新制造”模式在我省许多地方已现雏形。通过互联网实现融合创新，制造企业的内外部组织正从有界趋向无界、从有形走向无形、从垂直变为扁平。

推动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万亿产业重点突破、率先发展，已是浙江在新一轮经济竞赛中再度引领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举。其中，尤以信息经济最引人瞩目。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浙江全社会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 2728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14.1%。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最前沿信息经济，正与各行各业加速渗透融合：利用“互联网+时尚”，平湖箱包企业组团上网，拓展箱包线上线下交易渠道；利用“互联网+健康”，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在造福千家万户的同时，孕育出巨大的商机……

这些新动能正在因其成长性高、辐射面大、带动力强的特点与优势，既在当前稳增长与促升级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也日益成为浙江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希望所在。

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拳拳管用，让全省的经济结构脱胎换骨。今年前三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在 8% 以上。

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浙江还打出了“小镇牌”。特色小镇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这里，供给约束正在消融：凡是国家和省里先行先试的改革试点，特色小镇优先实施；凡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改革，允许特色小镇先行突破……

特色小镇的良好生态不仅使内在的发展动力得以充分释放，对外在的高端要素资源也形成强大的吸附力，供给要素水平和有效利用率大幅提升。今年前三季度，130 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和培育对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项目）1101.1 亿元。

新发展，绿色前行呼应民生福祉。入冬以来，一场大范围雾霾笼罩中国。明天是“雾霾灰”还是“天空蓝”？PM2.5 的数值时时牵动

着人们的眼光。这些年，人们对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盯着经济数据的涨落，忽视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多少，就会透支社会发展潜力，发展也终将难以持续。

只有绿色发展，才是永续发展。我省打出的这套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以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为目标，是提高可持续发展力与获得感的决胜未来之招。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所共知的是，“五水共治”是推进浙江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这项改革之举从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出发，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因而获得了广泛支持。

有民本温度，就有改革力度。至今年 11 月底，全省 221 个省控断面Ⅲ类水以上占 76.9%，比 2013 年提高 13.1%；劣Ⅴ类水断面占 2.7%，比 2013 年减少了 9.5%；全省垃圾河、黑臭河已基本消除。

浙江的治水已经走向长效化、制度化。就在最近，河长制走向全国。12 月 13 日，水利部、环保部等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召开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视频会议。浙江等地在会上作典型发言，向全国介绍河长制经验。

随着持续打好“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等一系列组合拳，浙江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观。省环保厅近日公布 2016 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全省平均得分较去年上升 10.5%，且连续 5 年逐年上升。

在治水拆违的基础上，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大幕已经拉开。浙江瞄准小城镇这块环境短板，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践行“绝不把违法建筑、污泥浊水和脏乱差环境带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承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浙江人民尝到了甜头。在“两山论”的发源地安吉，过去的 12 年中，当地财政总收入由 7 亿元增加到 55.68 亿元，年均增长幅度超过 2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5402 元增加到 23610 元，由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变为高出 1000 多元。

### 3、新常态新使命新征途

新常态，新使命，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浙江要如何认清形势、

顺势而为？在12月27日召开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要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持续深入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稳中求进、勇立潮头。

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浙江打出了这样一套经济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率先实现现代化，是浙江发展到今天的历史性考题。近年来，浙江打出了一套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治水为突破口，以“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为核心的经济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三改一拆”为新兴产业提供了空间；“五水共治”倒逼“低小散”企业转型升级；“浙商回归”引领新兴产业回归；“四换三名”为实体经济注入升级新动力；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引领“七大万亿产业”率先发展；特色小镇建设，使发展动力得以充分释放。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让浙江省经济结构脱胎换骨，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观，绿色发展惠及民生福祉。

打通转型脉络、融合新旧产业、呼应民生福祉，这套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招数、浙江路径。

组合拳今后怎么打？重点打什么？会议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打赢“拆治归”三场大仗，突出创新驱动发展、突出实体经济提升发展，突出“互联网+”“标准化+”，全力抓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

站在历史新方位，浙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

2017年，浙江将积极推进拆除违法建筑，消灭污泥浊水，淘汰落后产能；

2017年，浙江将聚焦纺织、服装、皮革等传统产业，修复传统动能；

2017年，浙江将大力推进农业绿化、农村美化、农民转化，走出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2017年，浙江将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新经济，发展壮大新动能；

2017年，浙江将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改善民生，提高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本栏目参考文献：

- 1、南方日报：稳中求进，认识中国经济新方位[EB/OL].南方 Plus, 2016-12-16.
- 2、杨光志.经济新方位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境界[EB/OL].华龙网, 2016-12-16.
- 3、李建.中国经济新方位：引领民族复兴的澎湃动能[EB/OL].南方网, 2016-12-15.
- 4、秦仲.中国经济新方位 世界发展新航标[EB/OL].南方网, 2016-12-16.
- 5、杨迪.新发展理念标注中国经济新方位[EB/OL].人民网, 2016-12-15.
- 6、张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新动能新方位转变[EB/OL].南方网, 2016-12-23.
- 7、何苗，张赛男.中国经济“新方位”须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N].21世纪经济报道, 2016-12-16.
- 8、李盈.经济新方位 筑梦新起点[EB/OL].南方网, 2016-12-15.
- 9、袁清，袁清：“新方位”，时空坐标和哲学思辨[EB/OL].和讯网, 2016-12-17.
- 10、王南.经济企稳助力中国站上新方位[EB/OL].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12-16.
- 11、“一带一路”新方位：中国民企如何做好“内外联动”？ [EB/OL]中国青年网, 2016-12-28.
- 12、校准中国经济的“新方位[EB/OL].央广网, 2016-12-15.
- 13、夏宝龙：坚决贯彻总基调 坚定打好组合拳[EB/OL].浙江在线, 2016-12-28.
- 14、历史新方位怎么找 浙江打好一套转型升级组合拳[EB/OL].浙江新闻, 2016-12-27.
- 15、新常态新使命 浙江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EB/OL].新蓝网, 2016-12-27.

### 三、明确新担当，谋求文化建设新发展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全局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大智慧、大战略和大思路，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主要包括以“六个一”为主体内容的基本框架：

一面伟大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习近平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形象、是方向，只有旗帜正确才能方向对头，大家才知道跟你往哪里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个价值引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认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前进的价值引领，为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一个文化根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认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沃土，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雄厚根基。为

此，习近平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达到“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之目的。

一项战略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极端重要”的位置要求全党引起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高度自觉性和成熟性。

一条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文化如何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呢？习近平认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必须“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奋斗目标，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切文化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都要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来进行。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文化思路的“六个一”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大思路”的主题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它的深厚

根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其战略重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其内在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发展目标。灵魂——根基——重点——保证——目标，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文化大思路的“总布局”。

## （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前，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思想的时代价值，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内生力量。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实际上，这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的兴盛为支撑。“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需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作为指引，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作为支撑；走兴国之路、强国之路，首先需要有凝心聚气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这样的指引、支撑、魂魄，就是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今天，能够“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十三多亿人口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这个理想信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表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领导人民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民族特质，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既是对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其中，改革是破除社会发展障碍、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引擎，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二者都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禀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二者生长的根基，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固有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升华，二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只有“继往”才能“开来”。

就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来说，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管子》中即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而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创造的一个个辉煌盛世，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寻求富强的历史探索。民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原意是指“民之主”，即管理人民的君主，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为约束君权，先贤们还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这些思想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主理念。文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是指人的教养和开化，正是因为有了文明，历史上的中国才博得“礼仪之邦”的美誉。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个人层面，它是一种修养目标，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社会层面，它是一种理想追求，比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就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来说，自由理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失，而且常常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庄子的《逍遥游》奠定了自由的思想基础，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了自由的最高境界。平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墨子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都隐含着人格平等的思想。公正理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墨家的“举公义，辟私怨”、法家的“公平无私”“公正为民”。法治在中国古代也有着丰富的可供挖掘和传承的思想资源，如韩非的“法不阿贵”、商鞅的“刑无等级”、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等。

就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来说，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无不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拳拳之忠。敬业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一种道德操守，从“敬业乐群”“敬事而信”到“专心致志，以事其业”，到梁启超的“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都对中华儿女起到了激励与教育作用。诚信，如荀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诚”、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历来都被视作为人之本、成事之基。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它的经典表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汇聚了历朝历代的治国理政智慧，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包括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将其归纳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主要方面。中华先贤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这些“秘诀宝典”“金玉良言”，同样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面对如此厚重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不仅勤于用典、善于用典，而且能把这些典籍、典故作为今天的镜鉴，从中找到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钥匙，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习近平借用古人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习近平借用“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推进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立场的，习近平借用“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强调改革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但又不是什么都能改。又如，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双轮驱动，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习近平借用“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为回答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习近平借用“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全面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习近平借用“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都在于实施，习近平借用“徙木立信”的典故，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习近平借用“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俗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警言，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纪律是党的规矩和生命线，习近平借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纪律。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由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习近平不仅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向全党发出警示，而且明确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再如，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尚和合”的智慧，将其运用到外事工作中。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借用《左传》

里的话向世界传达“和而不同”的思想；他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向世人阐释源远流长的中国“和”文化；他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向人们介绍“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中华传统理念。如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镜鉴，现实政策和深层哲理有机统一，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色。

## 2、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这从总体上说明了习近平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构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基因。只有不断从传统文化的母体中汲取滋养、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国家和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根’

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但是也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所以，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属于精华，对当代仍具有积极、革新、进步的意义，哪些内容属于糟粕，对当代只具有消极、保守、落后的意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之后为我所用。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继承传统文化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能作茧自缚，而应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对其中适合协调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作出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阐释，赋予其时代内涵，孕育其新形态。这也就是习近平所倡导的：“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让中华文明在革故鼎新中再谱新曲、再创辉煌。在习近平看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其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就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资源，推动其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直接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是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发展实际，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适应，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劲动力；“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就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重新包装，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用符合时代需要的形式对其作出新的阐释，达到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目的。

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其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就是使优秀传统文化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解决时代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带动潮流、引领时尚，积淀新的文化底蕴，孕育新的文化形态。“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就是要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放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学习借鉴其中对我有益的成分，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开拓创新，为我所用。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近代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不加分析地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一种是死守旧有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两种错误思潮都有其新的表现形式。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所以必须全面否定，进而打出“全盘西化”的旗帜，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对此，习近平有着鲜明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必须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此全民都需要“尊孔读经”、穿汉服、行拱手跪拜礼，甚至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政治主张。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矛盾体，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即使对于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运用其服务

于中国社会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其他什么主义。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如习近平所说的：“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 3、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人类文化传统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演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文化自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其社会存在的基础有日趋狭窄的趋向，其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的已濒临消亡。但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作为有机整体，是由各种不同存在形态的文化相互关联而构成的，其中文化遗产是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加倍重视优秀文化的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之一，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我们不仅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而且要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延续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精神的凝聚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中华民族从分散走向融合的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文化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但更多地表现为这些文化现象所蕴含的理念、规则、秩序和这种文化所体现的独特信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都需要凝聚力，而一个群体或者民族的凝聚力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来自于文化认同。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民族信仰和社会认同形成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证明其世界上存在的最有效手段。

中国的国家安全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条件就是国家内的各个民族之间具有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来源于文化认同，文化的认同感成为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是国家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必须做到以传承文化为主体，构建科学的文化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 （1）实施文化传承战略

加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挖掘和整理。我国目前应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普查，研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从国家政策层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指引，采取保护措施。

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把传承人对保护与开发的作用提高到战略性高度上来，并积极采取可行措施进行落实。如上海、浙江、宁夏等省市都出台了地方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并对国家和省级传承人给予一定补贴。对于传承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师带徒的方式，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文化遗产的学习中来；另一方面可通过举办活动，在学校、社会中普及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能；另外文化遗产所在社区的居民也应担当起继承者的角色，使文化能够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一切既离不开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更离不开传承人和继承者不断的努力。

### （2）实施培育战略

制定标准、依法保护文化遗产。标准和法律是有效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证。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就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保证。国家应强化文物保护立法和执法；建立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统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制定明细标准，推动传统工艺走向精细化；加强古代典籍文献整理，推进国家典籍资源规范化、数字化等等。

培育文化遗产产业基地，发展绿色文化产业。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文化遗产产业基地，发展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的绿色文化产业。例如可以利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建立古玩交易

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等。

### （3）实施推进战略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大众普及。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遗产与创意设计相融合，创造出更多贴近生活的文化产品，普及文化的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大众化普及。。

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大力创造文化的新的当代表达形式，借助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以求繁荣和发展，要把“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主动输出带有本民族特点的优秀文化，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 4、新媒体语境下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和途径

新媒体为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提供了便利，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引导，响应国家“互联网+”战略，使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珠联璧合，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创新驱动力。

（1）加强新媒体技术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与“和而不同”思想，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它所能涵盖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人生信仰的范畴和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大众人生境界的提升，弥补信仰上的迷失，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为我们和平发展、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深刻启示。“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表述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和开放兼容性质的生动表达。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为我们凝聚人心、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犹如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之中，既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自信的恢宏气度，又折射着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

共同体意识，凝聚着振兴中华的文化血脉。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有益借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精神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又经过长期积淀和传承，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元素，塑造了中华儿女典型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理念，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推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动力之源，“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一系列重民、富民、贵民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这是以民为本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语境中的体现。

(2) 以人才优先战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政府重视、政策和财政的多重支持是培养并吸引优秀文化、艺术和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打造普及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重点发展动画、漫画、电影、电视剧、音乐、游戏等媒体产业，将发掘整理出来的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美丽传说和美好故事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充分利用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文化遗产数字化是一件宏伟、急迫的事，国家应大力支持此类人才的培养，利用现代技术将其信息化、数字化，使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配套的数字化项目，使古迹得以保留，存入档案库。二是在戏曲上充分利用新媒体。让戏曲加上流行充分融入到新媒体，实现不同艺术形式的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最终形成既保留专业的戏曲唱腔又具有鲜明现代流行元素、将数字媒体艺术与数字媒体技术结合的特色文化艺术形态。积极利用新媒体打破常规，将传统文化拓展开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传统文化，让年轻人更容易消化吸收、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传统文· 84 · 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三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上充分利用新媒体。中国是多民族汇集的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具有无穷魅力，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的繁荣少不了每个民族的贡献。动画《阿凡提的故事》，打开了新中国以来大众对维吾尔族最广泛的认识；杨丽萍的《云南印象》让大众了解了云南、白族、少数民族的孔雀舞。借助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会传播的更远。

(3) 以新媒体技术为载体, 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重要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 将其打造成中华民族形象宣传的新窗口。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优势, 加强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与传播, 打造民族文化精品, 这不仅可以对国民进行循序渐进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洗礼, 还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介重新建构起更加符合现代形势的文化观。同时, 避免传统艺术形式因内涵意义不易理解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也避免产生因为新媒体艺术重形式轻内涵而导致主流艺术缺乏文化深度的社会现象, 以媒体语言整合传统文化精神, 让世界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

充分利用新媒体, 将其建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桥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相比于军事、经济、科技等国家硬实力, 优秀文化、发展模式、思想观念等软实力, 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 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而新媒体恰恰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沟通的桥梁, 通过这个桥梁可以实现交流意见、取得共识, 从而提高核心价值观对大众的影响。

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 将其打造成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立体平台。新媒体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枯燥的文字中剥离出来, 给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方式。一方面丰富新媒体的建立和使用形式。新媒体的使用, 可以使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更加丰富, 传播速度更加迅速, 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更大, 这些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积极运用好网络数据库。通过课件、动画、游戏、视频等多种形式, 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层次公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 通过门户网站、手机报、微博、贴吧、APP 等形式, 传统文化的公众互动形式将变得更为多样。

将传统教育形式和新媒体形式相结合, 加强中华经典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大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和弘扬推广工作, 使其进书本、进学校、进课堂。一是运用好幻灯、动画、校园 cosplay 秀等不同媒体形式。调研表明, 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成为青少年喜爱

程度最强的媒体。对于越来越多元的媒体形态，传统文化与其结合也应更加多元化。二是借助新媒体，在学校开设经典国学、古诗词鉴赏课程，开展古典名著鉴赏及书评活动，组织观看传统文化影像资料、书法展览等。如网络平台未来网《中国少年国学院》是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应用新媒体手段在青少年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通过开放的理念正确引导和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从而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认知和继承。

(4) 让新媒体技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文化面临的是机遇与创新、主宰自我精神气概及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诉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现场表演与高科技精密结合，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2010世博会上惊艳亮相的《清明上河图》利用高科技影像技术，赋予人、物鲜活的生命，相关图片、视频、评论在微博、人人网上更是被大量转载而登上热搜榜。另外，中国的音像制品、图书、服装、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借助新的传媒技术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各地，使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由此可见新媒体助推中华优秀文化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媒体，以易于沟通的新话语形式把握主导权而达到了传播民族文化的积极效应。二者的有机结合必将带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所以，我们必须避免简单意义上的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堆砌，拒绝盲目地模仿西方，而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新媒体延展的可能，以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才能让尖端的数字技艺承载起古老的东方气韵，借数字媒体之翼，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日腾飞世界。通过传统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各阶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传播覆盖，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深入人心，迎来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伟大复兴。

### (三)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信息多元化的时代，人们足不出户便

可了解国际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要净化网络环境，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发展环境，推进网络发展规范运行，传播正能量，坚守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1、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

加厚互联网文化土层。网络时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息源，例如，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可谓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但是信息碎片化、良莠不齐。有些所谓的“大众知识分子”虽然是网络常客，但在其主导下的网络语境大众化、娱乐化的倾向和单薄的文化土层，毕竟让有识之士担忧对下一代的潜在影响，这种网络文化缺乏创新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知识界的深层缺乏发声，尤其是我们的两院院士、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学部委员和中国作协委员等资深专家缺乏铿锵有力地回应，东风没有压倒西风。同时，作为网络文化的建设者也大可不必过分伤感于“盛世道衰、世风日下”，而更需要我们研究和建立加厚互联网文化土层的体制机制，在为各种文化搭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的同时，更要为网络文化划定警戒线，加强主流文化的守护力度，筑牢先进文化阵地。首要任务就是以更宽广的战略思维、更锐利的世界眼光，洞察、审视和加厚网络时代的文化土层。

发挥主流媒体引领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创办的《新华日报》、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等报刊杂志，配合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最大限度争取和团结了青年阶层、市民阶层和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适应新技术革命对舆论领导权的挑战，宣传动员的看家本领不能刀枪入库。网络文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笔杆子就是键盘，话语权就是互联网浏览入口。面对多元和此起彼伏的文化舆论竞技，党的主流媒体要当好“职业队”的主角，牢记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拥有新闻职业的担当精神，精准掌握党的“话语权”。在与各种网络时代涌现

的“公民记者”“公众报道者”等“业余队”同台竞风流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要首先站出来，围绕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释放正能量，增强社会各阶层的粘合度和认同感。

## 2、推进网络的规范运行

实现“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的目标，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需要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动性、捍卫人民网上权益，形成网络空间治理同心圆。为此，要做到“五个注重”。

注重制度完善。本立而道生，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强化制度建设是一项根本性任务。只有以科学的制度为根本遵循，形成依法治网、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和短期行为。我国立足国情，充分总结近年来网络安全工作经验，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进程。《网络安全法（草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程序。

注重体系建设。我国互联网起步虽晚，但起点高，过去 22 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治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但长期以来行政监管投入的精力过多，有些方面重视程度、投入力量不够，需要好好补课。今后，要从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强网络治理体系建设，使网络有害信息治理有法可依。

注重奖惩并举。奖励和惩罚是网络治理激励手段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一方面，对于公众举报的网络有害信息，符合条件的要给予相应奖励。对于积极受理公众举报、自觉处置有害信息的网站，要予以表彰。另一方面，对于消极对待公众举报、不能自觉承担信息“把关人”“守门员”责任的网站，要严格依法惩处，并加大曝光谴责力度。

注重宣介引导。尽管近年来网络举报知晓度、认知度有了较大提升，公众举报网上有害信息的积极性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与我国网络发展水平、与有害信息总量相比，网络举报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层次和水平。各地、各网站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宣传形式，加强网络举报品牌包装，吸引公众广泛参与网络有害

信息打击、治理工作，同时有效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注重提升媒介素养。虽然我国是网络大国，但网民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不高，掌握的网络举报知识有限。各地要从教育入手，从自身做起，吸引全社会参与，培养有高度的安全意识、有文明的网络素养、有守法的行为习惯、有必备的防护技能的“四有”中国好网民。

要着眼于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和区别，加快探索和建立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上线下共享共治的互联网治理新格局。互联网的治理结构包括政策法规、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人才支撑等要素。要以“制度+技术”为手段和抓手，建立健全网信、工信、公安、检察院、法院跨部门、跨地区的网络违法信息处理的共享和治理体系。一是完善违法信息和垃圾信息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合协调和攻关，尽快完善不良违法信息的政策法规治理体系，为净化网络生态提供保障。二是加强专业执法队伍建设。要借鉴美国组建网络部队的经验和做法，强化国家统筹，加大垂直管理执法力度建设，坚决打击违法信息的传播行为。三是要善于运用举国体制办大事的优势。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大力推进科研管理、人才选拔、激励机制创新，力争尽快突破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核心技术瓶颈制约问题，为互联网治理提供战略支撑。四是鼓励引导广大网民参与举报。建立问题信息的预警、跟踪、分析、研判的综合治理体系和长效机制，实现线上线下联合共享治理。

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等特点，多方力量具有获取各自话语权的自由，这使传统的以政府为主，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渐露弊端。加强网络文化生态治理，就要发挥好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加强行业自律建设。针对中国互联网协会各界组织，各会员单位要严格制定自律章程。同时，政府要加强对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对其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监测评估，必要时可提起公益诉讼。另外，互联网协会应加强调研和决策咨询力度建设，多为政府决策和互联网治理工作提供资政服务。

### 3、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说，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此，习近平提出 5 点主张。

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才能让信息资源充分涌流。中国正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宽带网络将基本覆盖所有农村，打通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让更多人用上互联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共同推动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

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发挥互联网传播平台优势，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我们热情欢迎各国企业和创业者在华投资兴业。我们愿意同各国加强合作，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等，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网络安全是全

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希望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的平台，共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

#### （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世界影响力

##### 1、“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

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故事，但如何让感动了我们的故事感动世界，就有一个方式和途径的选择问题。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契机，也是中国主动进入“国家公关时代”的起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主场”外交频频发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为“讲好中国故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通过外交活动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和发展理念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影响力、吸引力，他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归为四个方面，即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

‘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通过外交活动阐明中国的制度、道路、立场、原则、主张，解释其背

后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支撑，既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其一，郑重表明中国梦是和平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中国梦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在完成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做出了贡献。“历史将证明，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是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化干戈为玉帛”等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美好梦想。

其二，适时阐释中国特色，增强“四个自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奋斗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创造“中国式奇迹”，破解“中国式难题”都依靠这条正确道路。“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

其三，“用事实说话”，强化合作共赢的利好观念。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梦对世界的积极意义，都要靠事实来说话，用行动去证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50年来，双边贸易额比建交之初

增加 500 多倍；人员往来从无到有，已经接近每年 200 万人次；有 5 万法国人正在学习汉语，学习法语的中国人数达到 10 万。不久前，苏菲·玛索走上了中国收视率极高的马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中法合作潜移默化影响着两国人民生活，必将为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福祉。”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潜力，为合作共赢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合作共赢提供了良好意愿。

其四，以睦邻友好、亲诚惠容突显“周边是首要”。习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时，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阐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亲仁友邦、以诚待友、政经互惠、文化包容的新理念。2014 年 8 月，习近平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基于对我国发展现状和国际地位的清醒认识，阐释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表明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突显“周边是首要”，近睦远交，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 通过国际会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借助于一定的途径和载体。大型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是展示国家发展成就，宣传国家形象，阐释国家发展理念的窗口。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概括阐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所具有的重要启示，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2014 年北京 APEC 从会标设计、领导人及其配偶的服饰到晚宴菜谱、餐具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我们之所以选择水立方来举行这个晚宴，是因为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2000 多

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意思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亚太经合组织以太平洋之水结缘，我们有责任使太平洋成为太平之洋，友谊之洋，合作之洋，见证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繁荣、进步”。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更是引经据典地阐述了中国的和平理念和态度。

通过文化交流凸显本土化和亲和力

“中国立场，世界表达”，要让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话语体系、思维习惯的受众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必须采用恰当的方式让听众感兴趣、听进去、受到感染、产生共鸣，进而自由选择。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总理推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后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的《梁祝》很快带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走向世界。这说明对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激发对方的兴趣，以不同文化间的共性为切入点。近年来，通过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得到不断发掘，优秀文化精粹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讲到了前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在法国演讲时，他谈到毛泽东和戴高乐在冷战期间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还列举了把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医生贝熙叶，以及在四川汶川地震期间舍身守护困在电梯的小女孩的军医乌埃尔。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动情地讲了两个故事：一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中国同胞的德国友人拉贝；德国葡萄专家诺博和汉斯资助了8名当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的故事；在印度尼西亚的演讲中，提到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的两国友好交往；在墨西哥参议院演讲时，他讲述了墨西哥著名作家帕斯曾将两千多年前中国哲人老子、庄子的思想翻译成西班牙文，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谈到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马克林教授孜孜不倦地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还特别提到马克林教授的儿子斯蒂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这样

讲述“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将历史感、现实感、亲近感融为一体，以“润物细无声”的巧妙方式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

## 2、“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借鉴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7%，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其文化产业产值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也达到了20%，中国这一数据2011年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因此，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借鉴别国经验。

一是内容方面。近年来，我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宣传国家形象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从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开设到2011年“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闪耀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从莫言以山东高密县东北乡为创作土壤的作品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到中国电影、图书、语言、走出去，各种文化交流、文化城市品牌海外营销；从《舌尖上的中国》在海外播出到“春晚”国际版，再到《超级工程》等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中国；从《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的采编到纪录片《大黄山》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从中国影星、地标走进好莱坞电影到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拍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红色中国》和《青春躁动的中国》等，“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形式、手段更加新颖多样，不仅注重故事本身的生动、鲜活、接地气，而却凸显正确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在内容上，我们仍然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一是讲述普通老百姓和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以引起受众的共鸣；二是突出爱情、亲情、友情、生命等人文情怀；三是展现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和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二是形式方面。同样的故事，表达形式不同，效果差异较大。近年来，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剧创作拍摄；从各种戏曲到绘画、书法、民俗工艺品；从代表性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到普通纪录片，讲中国故事的

精品力作越来越多。但在文学作品、影视制品、动漫作品的创作方面，需要借鉴打动观众的三个因素，即跌宕起伏的情节、浪漫主义色彩和幽默的艺术风格。美国好莱坞影片之所以能够在绝对数量上占据全球票房，除了编剧、技术、国际化与市场化运作体制外，科幻片、战争片、魔幻片所展现的想像力、新奇性、诙谐幽默，故事片所展现的情节通俗、明星阵容、成功塑造普通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值得借鉴。

三是媒体方面。在新媒体日益普及和影响力扩大的今天，移动化、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定制化、4G、大数据等极大地影响着人们获取新闻和资讯的方式。然而，在适应大数据时代，应用新媒体，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美英等西方传媒具有全球传播的强大影响力，美联社、路透社、BBC、CNN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是全球传播体系中发布中国新闻、塑造中国传媒形象的主体，目前世界各国传媒报道中国主要引用的新闻稿多来自以上通讯社和媒体。新华社规模虽已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目前还无法与国际主要媒体抗衡。”因此，要从三个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媒体运作模式及作用：一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整合，如“今日俄罗斯”及“半岛电视台”都加快了这种整合；二是建立广泛的全球网络，增强时效性和本土化；三是官方媒体对重大负面事件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四是抢占网络社交平台，如借鉴“今日俄罗斯”“独家”、“迅速”、“准确”的独特报道风格，聘用“本土”记者等做法。“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不仅面临国内发展中的“新常态”，也需应对来自国际方面的新挑战。创设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任重道远，需要不断跟踪和总结过去的成功做法，学习别国的成熟经验，创新理念和路径，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打造自己的媒体平台。

本栏目参考文献：

- 1、韩振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EB/OL].光明网，2016-01-10.
- 2、左鹏.论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03）.
- 3、丛瑞雪.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J].企业文化，2016（10）.

4、音雪彦.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03) .

5、李燕, 闫瑞.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维度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6, 17 (04) .

6、刘永启.网络文化的价值困惑及治理思考[J].理论与当代, 2016 (08)

7、姜玉梅.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经验与借鉴: 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视角[J].前沿, 2015 (03)